

## 學人年表

### 方師鐸教授年表(一)

陳惠美\*、謝鶯興\*\*

「方師鐸教授年表」是以楊承祖教授〈故東海大學教授方師鐸先生事略〉為主要根據，佐以東海大學《校刊》、《會議紀錄》，及方先生的著作與上課之講義等等，曾彙編成《方師鐸先生學行年表初編》<sup>1</sup>。方先生之二女兒謙亮女士，協助東海圖書館，陸續整理其發表在報章雜誌，但未收入於專書中的作品，蒐集成書；又將其兄謙光先生撰寫的稿件，彙為《風雨兼程--方謙光作品集》，補充許多原先所不知道的資料，我們為配合「人文東海」的規劃而重編。

方先生的一生，約可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出生於揚州，成長與求學皆在北平。從方謙光〈童年的回憶〉提到：「我的北方老家是在一座有著高大的紅牆和金黃色琉璃瓦建築的古老都市，她經歷了千百年更換過許多朝代，她依然使人眷戀，煥發著光彩。大概是在六十多年以前，爺爺來到這座古城，最初是住在城西南角叫做『月臺大門』的王爺府。聽說那原來曾是一座『凶宅』，家裏人都不願意在那裏住。當年爺爺在『總統府』任職，花錢買下了離總統府不遠的地方的一片荒地，就在這塊荒地上，爺爺自己設計，親自監工，蓋起了一大片房子。」<sup>2</sup>可以瞭解楊承祖〈故東海大學教授方師鐸先生事略〉說方先生：「誕生於揚州本宅，少隨親宦居北平。」

第二階段是「七七事變」的全面抗戰，大學畢業後到昆明就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進入滇緬邊區進行水擺夷語言實地調查。勝利後，接受魏建功老師的邀請，到台灣協助進行台灣地區的國語推行。

第三階段是與臺靜農先生等人，從上海搭船，到台灣的基隆登岸，開始進行台灣地區的國語推行，以及籌辦《國語日報》。

第四階段是 1960 年起，受聘於東海大學中文系，曾接長華語教學研究中心主任，接長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到 1993 年 7 月，以年力衰，堅辭中文研究所授課一事；到 1994 年 8 月 28 日，安逝於東海大學的退休宿舍。

---

\*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sup>1</sup> 陳瑞洲、謝鶯興合編，由東海大學圖書館於 2000 年 12 月 22 日印製數本典藏，但未正式出版。

<sup>2</sup> 見《風雨兼程--方謙光作品集》頁 32，台中：方謙亮，2014 年元月。

因此將方先生年表分成幾個單元，藉以呈現他 80 多年的各項事蹟，著重於他在東海 30 多年的活動。

### 壹、渡海來臺灣之前的事蹟

民國元年(1912 年)，1 歲

農曆 2 月 25 日，生於江蘇揚州<sup>3</sup>。排行第三。<sup>4</sup>

民國十三年(1924 年)，13 歲

請老師到家裡任教，後就讀初中。<sup>5</sup>

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22 歲

輔仁高中畢業<sup>6</sup>，考入北平燕京大學<sup>7</sup>醫科，與吳曉鈴先生同學。<sup>8</sup>

---

<sup>3</sup> 按，〈古老的住宅〉云：「我幼時是在揚州長大的。我家雖不是揚州人，卻在揚州落了戶。聽大人說：我們是從安徽的徽州府搬到揚州來的。」(見《揚州閒話》頁 1~2，原刊載於《台灣日報》副刊，民國 78 年 4 月 7 日，後收入《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方謙亮、施麗珠、謝鶯興編，台中：方謙亮限量發行，2001 年 12 月)方謙亮〈揚州閒話序〉引先生於 1985 年手寫的「家訓」云：「兒時在揚州故宅，中堂懸有曾祖父紫亭公手書格言聯。」(見頁壹，同上)。

<sup>4</sup> 按，方謙光〈望門寡〉云：「爺爺和我都是屬龍的，爺爺比我年長六十歲，推算起來應當是出生在一八八〇年。爺爺有三個兒子，長子方師夏，次子方師龍，幼子方師鐸。方師鐸就是我的老爸。……我老爸出生在一九一二年。」見《風雨兼程--方謙光作品集》頁 69。

<sup>5</sup> 按，〈未受工業污染的小城(上)〉云：「揚州沒有工廠的另一原因是沒有鐵路。別說鐵路了，就連公路都沒有。一直到我進初中時，揚州城外才有一條很短的小公路，從揚州城南直通長江邊上的『瓜洲』。又，〈未受工業污染的小城(下)〉云：「揚州過去文風極盛，居然沒有大學，最高學府就數省立師範學校(後來改為省立揚州中學)，另外縣立的有一所初中；小學很少，設備又差。我小時候進的是請家館，就是請老師到家裡任教，教的是中國書，沒有英文，也沒有數學課。」(見《揚州閒話》)。二篇提及小學是家館，都說曾讀初中，但未明言係哪家中學。

<sup>6</sup> 按，〈北平的三 D〉云：「我高中讀書時的輔仁中學，就是以前的濤貝勒府改建的。」(見《北平憶往》頁 45，原刊載於《台灣日報》副刊，民國 78 年 6 月 25 日，後收入《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北平憶往》，方謙亮、施麗珠、謝鶯興編，台中：方謙亮限量發行，2002 年 1 月)。方謙光〈童年的回憶〉云：「大概是在六十多年以前，爺爺來到這座古城，最初是住在城西南角叫做『月臺大門』的王爺府。……我們家就住在胡同的盡頭的一個退了色的紅漆大門裏。……還有一座兩樓兩底的小樓。樓下是廚房，樓上聽說是爸爸當年讀書的地方。」見《風雨兼程--方謙光作品集》頁 32。

<sup>7</sup> 按，〈老「北大」的老傳統〉云：「我是剛從『燕京大學』轉到『北大』來的，當然對『北大』的一切設備都看不上。『燕京』一切都是那麼現代化，宮殿式的建築，觀光旅店式的宿舍，到處都有隨手一壓就自動噴水，可以生飲的自來水(現在台灣還做不到)，床鋪是單人小鐵床，當然不會有臭蟲。」(見《北平憶往》頁 1~2)。〈五十年前水擺夷·緣起〉云：「吳曉鈴和我兩度同學：第一次是民國 22 年，我們同時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我在『燕京』只讀了一年，就轉學到『北京大學』，改念中文系

是年編《湖南省年鑑》。<sup>9</sup>

民國二十三年(1934 年)，23 歲

9 月，轉入北京大學<sup>10</sup>中文系語言文字組，受業於胡適、沈兼士、錢玄同、羅常培、唐蘭諸先生。<sup>11</sup>

---

的『語言文字組』。他隔了一年也轉進『北大』中文系，於是我們又『再度』同學。」(見《五十年前水擺夷》頁 1~2，原刊載於《台灣日報》副刊，民國 78 年 8 月 2 日，後收入《方謙鐸先生四部曲之五十年前水擺夷》，方謙亮、施麗珠、謝鶯興編，台中：方謙亮限量發行，2002 年 4 月)。

<sup>8</sup> 據「事略」。(「北大」中文系的眾生相)(見《北平憶往》)云：「我是在民國 22 年(1933)考進北平私立『燕京大學』(燕京大學是美國基督教會在中國所辦的大學之一，中共認為它是『美帝』所辦，予以封閉，現在將城內的北京大學遷入燕京舊址中)。我在燕京時國文成績很好，通過了『免讀』測試，可以不念大一國文，但是解剖學卻念的很糟。」(見《北平憶往》頁 8)。據〈北平的三道城〉云：「『天安門』的西邊就是『中南海公園』的前門---『新華門』(『新華門』正前方，垂直的一條南北向馬路，就是我家所住的『北新華街』)。」(見《北平憶往》頁 31)記載，參酌「事略」云：「少隨親宦居北平。」方謙亮《揚州閒話•序》云：「父親進北京大學讀書，祖父母也陪同前往，在北京置產，還特別為父親蓋了一棟書樓，讓他能在家中安心讀書。」可知方先生就讀輔仁中學時，應即住在此地。(見《揚州閒話》)。

<sup>9</sup> 按：是書藏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題「方師鐸主編」，由台北天一出版社出版，但未標明出版日期，僅於附註項題「館藏：民 22 年」。天一出版社係方先生大女婿朱傳譽經營，雖曾刊行先生著作數種，然民國 22 年，先生仍在北平燕京大學攻讀醫科，是否能編輯是書，令人生疑，因未見此書，暫記於此。

<sup>10</sup> 按：〈老「北大」的老傳統〉云：「《北平憶往》是五十年前我在故都求學的一切經歷，我是『北京大學』畢業的，……看起來卻是那麼破破爛爛，一切因陋就簡，不像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座有名學府的樣子。不談別的，就拿我住過的學生宿舍來說：那是皇宮後牆外面太監住的平房，陰沉灰暗自不必說，上面沒有天花板，下面沒有水泥地，連窗戶都是用木條釘成有空洞的格子物，別說蒼蠅、蚊子出入無阻，就連老鼠、麻雀也可以公然進出。」(見《北平憶往》頁 1~2)。

<sup>11</sup> 按：〈劉半農--教我如何不想他〉云：「我雖然也是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畢業生，可是因為我的大學一年級是在燕京大學唸的，第二年才轉到北京大學。我進北大的時候，已是民國 23 年的 9 月。」又，《北平憶往·「北大」中文系的眾生相》云：「我是在民國 22 年(1933)考進北平私立『燕京大學』……但是解剖學卻念的很糟：畫細胞的解剖圖時，一個眼睛看顯微鏡，一個眼睛畫圖，我總是辦不到，老是畫的不像樣。那位英國『老小姐』老是在我的圖上用紅筆劃一個大大的『F』(Fail)，剛好我姓『方』，第一個字母也是『F』，因此，被一些尖嘴的女同學稱我為『Mr. F』。一年以後，『老小姐』叫我轉系，我一生氣，乾脆就轉校，當時的校長是『司徒雷登』先生(Dr. Steward，後來當過美國駐華大使)，我糊裡糊塗地就闖進校長辦公室。司徒問我要幹什麼，我告訴他要『休學』。他追問我休學的理由，我就亂說一通，說是沒錢念下去了，得到外面去打工。他很同情我，馬上就口授一封信，叫秘書小姐打下來，立刻簽字交給我，我就憑著這封洋文信，到北京大學去報名參加轉學考。『北大』的教務處職員，從未見過這種怪信，不知如何是好，經過一再請示，驗明是司徒校長

###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24歲

從沈兼士先生習文字、訓詁之學。因沈先生兼任「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的工作，得以窺見秘府的藏珍。買下故宮影印明永樂初年大字行書本《碎金》。<sup>12</sup>

###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25歲

夏天，於北平北京大學攻讀訓詁學之際，圈點評注清朝王念孫《廣雅疏證》。<sup>13</sup>

按：東海典藏先生贈之是書，扉葉題「民國二十有五年，置於北平時正攻訓詁於北京大學也」。在魏張揖〈上廣雅表〉書眉有墨筆注二則，一云：「《爾雅·釋訓》釋文引張揖雜字云：訓者謂字有意義也。襄二十九年《穀梁傳》云：此致君之意義也。」二云：「臧氏在東曰：張稚讓言，叔孫通撰置《禮記》，不違《爾雅》。然則《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為叔孫氏所取入。故《白虎通義》引《禮記·親屬記》：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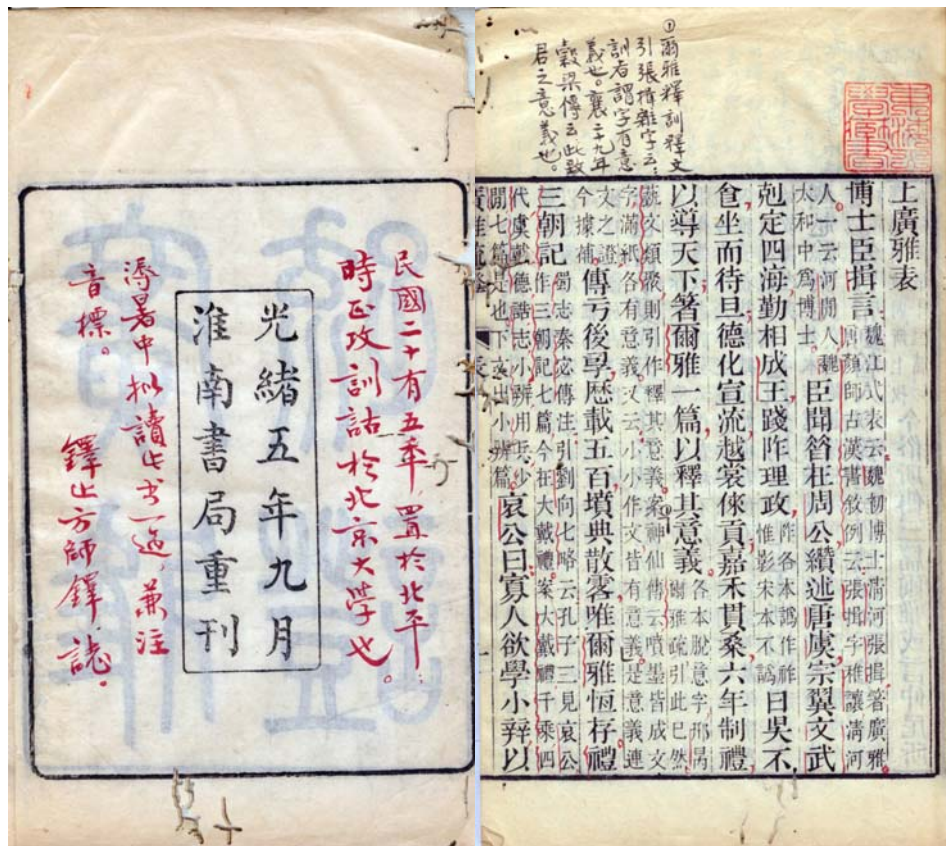
---

簽字無訛，才准予報名。……那時『北大』最出名的是中文系和地質系，我心血來潮地就報考了中文系。轉學考試的科目並不多，除了文學史和國學常識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一篇作文。……只記得當時『全國』報考北大中文系二年級轉學考試的，大概有二百多人，我只是其中之一，然而就錄取了我一人。……當時北大中文系分文學組和語言文字組；文學組鬧哄哄地，老師多，學生也多。語言文字組學生有小貓三隻，四隻，老師卻有十多位。……語言文字組的課程，就算是第一流的名教授，號召力也不強，像章太炎的嫡傳弟子錢玄同(就是『疑古玄同』)，教我們『韻書沿革』只有寥寥幾個學生；文字學權威唐蘭先生教我們『古文字學』時，就只有三個學生(現在台還流行的《古文字學導論》，就是那時候寫給我們的講義)。後來他又開了一門『古文字學研究』的課程，給果選課的就只有我一個人(均見《北平憶往》)。

<sup>12</sup>見〈明刻行書本「碎金」與敦煌唐寫「字寶碎金」殘卷之關係--「蒙求書研究」之一〉，見《方師鐸文史叢稿·專論下篇》頁157，台北：大立出版社，民國74年11月。

<sup>13</sup>按，〈沈兼士、錢玄同、馬廉和二羅〉云：「我現說兩件有關沈(按指沈兼士)、錢(按指錢玄同)二位先生上課的趣事：這兩位先生都是浙江人『鄉音無改鬢毛衰』。沈先生(按指沈兼士)教的是文字和訓詁，他說出來的『反切』，很少有人聽的懂。我記得他上訓詁學的時候，手上老捲著一本線裝木刻的《廣雅疏證》。他一邊講一邊拿著書，在教室不斷地遊走；從來不寫黑板，也不站在講台前講書。他手上雖然拿著書，可是從來不翻一下，那本書是不是《廣雅疏證》，誰也不敢保證。碰到他所舉的那個例，非查原書不可的時候，就一面遊走，一面信口叫一個學生的名字，叫他把那一段書查出來，而且高聲唸出。請想想看，我們上課的時候，每個人都抱著十大本木刻本的《廣雅疏證》上課；他所舉的那個例，究竟在那一卷、那一頁，誰也不知道；因此誰被叫上了，就中了頭彩，就得挨罵。」(見《北平憶往》)。可能就是上述的原因，先生才圈點評註《廣雅疏證》。

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文出釋親。《風俗通義》引《禮·樂記》：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葯，文出釋樂。《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文出釋水。孟子：帝館甥于貳室。趙注引《禮記》：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文出釋親。則《禮記》中之有《爾雅》，信矣。」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26歲

7月7日，北京大學畢業，偕張敏言小姐<sup>14</sup>南行至蘇州，參加基督教青年會戰時救護工作。

旋入南昌，加入軍政部傷兵管理處，醫護傷患。

秋天，與張敏言小姐結婚後，回揚州。<sup>15</sup>夫婦一起整理家中書畫碑帖，由

<sup>14</sup>按，1937年，先生與張敏言小姐成親。方夫人係河北安次人，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國文系畢業。

<sup>15</sup>按，方謙光〈方師龍傳奇〉云：「1937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七七』蘆溝橋事變，

夫人張敏言用毛筆小楷書寫「書畫碑帖目」二本，一本留在大陸，一本帶來臺灣，裡面記碑帖類 130 件，書畫類 466 件。<sup>16</sup>

按：現存是書空頁附記云：「三十三年雙十日明兒（作者方謙亮按：我的姊姊方謙明）頑皮，將此頁撕下自釘成小本學寫字，原頁已剪破不能復裝成幅，只好另書一頁以補之。憶二十六年秋與師鐸避難來揚州，終日在書樓中整理書畫，雖灰汗滿面不以為苦，遇名畫懸起欣賞以作休息，其中之趣味，非筆所能書，今相別數載，兒輩已能學畫習字。鐸現居何處頗不能知，且數月無信來，日夜以鐸平安為念，憶昔時相處書屋以愛好相同趣味相近，樂也相知；今景物依然與鐸相隔萬里，音信稀疏思之悵惘何之！三十三年雙十日敏記。」<sup>17</sup>

###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27歲

離開南昌，經湘、桂、安南轉走昆明，<sup>18</sup>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專攻語文之學，研究題目：「擺夷話」<sup>19</sup>。

---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同年正巧我父親，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並考入北大的中文研究所。由於時局動盪，北京即將淪陷，我父親的母校北京大學決定舉校南遷，並與清華大學和天津南開大學一起遷至雲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我的父母決定隨學校一起南遷。……當時我的父母尚未完婚，由於事發突然，情況緊急，祖父已經來不及為他們舉辦婚禮，只是在他們出發的前夕，帶著他們到北京中山公園裏的一個叫做『來今雨軒』的茶社，喝了一壺茶，吃了一點兒梅菜扣肉和乾菜包子、點心等，送上了長輩的祝福，就算完成了婚禮。我父母所選擇的路線，第一站就是先回祖籍江蘇揚州的老家。1937年底，我的父母親和二伯一道從揚州出發，由水路經安徽到江西，再由江西經陸路到達湖南。……我二伯再也無法推辭了，只能接受團長的安排，留下來幫助候車。我父母則幫不上候車的忙，但也想做一些抗日的工作。於是團長就安排我父親參加衛生隊協助到前線抬擔架救傷患，安排我母親到後方醫院去護理傷患。」見《風雨兼程--方謙光作品集》頁 73。

<sup>16</sup>按，方謙亮〈《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序〉云：「這些書畫碑帖早已不知下落了！而父母也已離開了人世，母親曾在民國 33 年在書目的空頁中留下了附記，看了頗讓人感動。」見頁參至肆，〈《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

<sup>17</sup>見方謙亮〈揚州閒話序〉，收在《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

<sup>18</sup>按，方謙光〈方師龍傳奇〉云：「次日清晨，我父母登上南下的順風車，從湖南至廣西出境，繞道越南河內，再由河內乘小火車輾轉數千公里才到達目的地昆明。」又，方謙光〈三人行〉云：「當年我的父母由北京出發，先到江蘇揚州老家，由江蘇經浙江到達江西，再由江西經湖南入廣西，從廣西進入越南境內，然後從越南的河內乘小火車轉到雲南，最後輾轉到達昆明。」見《風雨兼程--方謙光作品集》頁 76 及頁 100。

<sup>19</sup>據《五十年前水擺夷》之二〈年輕人的衝勁〉所述。

按：《閒話滇邊·西南的西南》云：「我在雲南大學調查方言的關係，認識了雲南西南部二十多個不同縣份的同學，供給我無數的有價值的活資料。」<sup>20</sup>

###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28歲

是年在昆明。冬天，從昆明隨馬幫深入滇緬邊區的擺夷，作水擺夷語言實地調查<sup>21</sup>，編成《擺夷語彙典》。

按：《五十年水擺夷·獸力運輸隊--馬幫》云：「民國 28 年，我在昆明隨『思普茶』場的『馬幫』深入雲南最西南端的『擺夷』區域。」<sup>22</sup>

《臺灣話舊·昆明變了》云：「我是民國二十八年的冬天離開昆明，到『思普邊區』去調查擺夷語言的。」<sup>23</sup>

《五十年水擺夷·十二版納》云：「雲南境內的『擺夷王國』是在車里一帶，包括車里、佛海、南嶠、鎮越、六順五縣和一個寧江設治局，此外還有思茅和江城二縣各一部份地方，也就是滿清末年引起英、法兩國外交爭執的『江洪』地方。……從調查原始民族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的立場來看，在雲南境內做擺夷族的學術調查，要比在越南、緬甸，甚至全部由泰族人建立的泰國境

---

<sup>20</sup>見頁 2，《方師鐸先生全集一之間話滇邊及天南談》，方謙亮、施麗珠、謝鶯興編，台中：方謙亮發行，2002 年 4 月。

<sup>21</sup>按，由昆明到滇緬邊的路線，參見：1.《五十年水擺夷·箇碧石鐵路》云：「從昆明到元江有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條是直路，可是山坡大，路途險，除了騎馬、坐滑竿、或步行之外，沒有旁的交通工具可以利用。……我去的時候是走山坡捷徑，從昆明直奔西南，沿著平坦的公路，傍著周圍五百里的昆明池，經過雲南省的魚米之鄉--呈貢、晉寧、昆陽、玉溪四個大縣；然後才離開公路，爬過峨山縣的高山，穿過陽武霸和青龍廠，到達新平縣；再從新平翻過兩座大山，渡過元江上的『鐵索橋』，到達元江縣城。」(見頁 20~21)。2.《五十年水擺夷·花腰擺夷》云：「元江的花腰擺夷，是現代泰族東北翼最突出的前哨。……研究民族和調查語言的學者們，都不願在交通頻繁、文化褪色的不純粹的種族當中，作費力不討好的工作。事實上，我們在元江花腰擺夷的村落當中，也發掘不出比其他泰族更保守、更奇異、更值得我們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在元江也就沒有多作停留，就繼續往西南前進，找尋更純粹更不漢化的擺夷部落。……從元江再往南到水擺夷區域的車里去，更得翻過好幾座更高的大山；交通如此不便，氣候如此悶熱，很少有外人敢侵入這惡劣的環境之，我想，這大概就是花腰擺夷之所以還能在元江區域繼續生存下去的原因了。」(見頁 44~48)。

<sup>22</sup>見頁 10，《五十年水擺夷》。

<sup>23</sup>見頁 18，收於《台中市籍作家作品集(79)》，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民國 89 年 11 月。

內，還更能得知泰族的原始面貌。」<sup>24</sup>

11月10日，寫信寄給顧頡剛先生。<sup>25</sup>

按：信云因等候白孟愚先生同行的緣故，11月7日才由昆明隨著馬隊出發。沿途所住，多係馬店，但過寧洱以後，將求馬店也不得了。此趟旅費頗貴，若經由滇緬公路出騰，經緬甸瓦城，乘火車至景東，轉入國境至佛海，可能尚有餘裕。信末盼老師能賜以新出版之報章刊物，以解旅途知識缺乏之渴。

12月7日，再度寫信寄給顧頡剛先生。<sup>26</sup>

按：信云：由昆明至玉溪為汽車路，過玉溪後即全屬羊腸鳥道的難行之狀，但卻玩味出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及太史公遊名山大川後而文章亦有「浩然之氣」之意義。距思茅城約十餘里，三山交匯之處，有一湖泊，湖畔即是壩子，有良田數十萬畝，溝渠井然，一片荒草無人耕種。在信中提出：抗戰以來，所有後方都市，皆有人滿之患；淪陷區內之人工多資敵用，實必一大損失；若能招大批難民，攜帶家小，來邊地開發；就原有的房屋，稍事修葺，就原有之溝渠，稍事疏通，則事倍而工半，邊地之繁榮，指日可望。同時主張：在此地辦一夷族學校，特編教科書，即用擺夷文教授，一方可不致引起夷族之反感，一方可達到宣傳之目的，提高擺夷文化，及其愛國情緒。希望顧先生能為此事多加宣傳，以抵於成。

###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29歲

1月14日，夫人張敏言手寫「房產契紙登記簿」，記錄揚州新城的房產間數。<sup>27</sup>

按：《揚州閒話·古老的住宅》云：「揚州的第二次大屠殺，是曾國

<sup>24</sup>見頁78~80，《五十年水擺夷》。

<sup>25</sup>發表在《責善半月刊》第1卷第6期，頁143~144「滇南通訊二則」，民國29年5月31日。收在「師鐸遺作及手稿83年11月14日整理」檔案。

<sup>26</sup>發表在《責善半月刊》第1卷第6期，頁143~144「滇南通訊二則」，民國29年5月31日。收在「師鐸遺作及手稿83年11月14日整理」檔案。

<sup>27</sup>據方謙亮《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序》頁伍。方謙光〈方師龍傳奇〉云：「我父母在1937年結婚，1938年在昆明生下我姐姐方謙明，1939年又在昆明懷上了我，由於在昆明生活條件太差，大人要忙於生計，孩子太小無法照料，父親決定讓我母親帶著我姐姐回揚州老家待產。1940年初母親帶著我姐姐回到了揚州老家。」見《風雨兼程--方謙光作品集》頁81。



藩的大軍和洪秀全的軍隊對揚州的爭奪戰。打來打去，揚州城裏的老百姓又死亡殆盡。我的小時候，還去過揚州南城的老宅子，那兒已成一片廢墟，看不到一間完整的房屋。亂平之後，我家就遷居到揚州新城的一棟老房子裏。據說那個老房子還有一小部分是明朝遺留下來的，其他絕大部分都是洪、楊之亂以後興建的。

1 月 15 日，夫人張敏言手寫「田產契紙登簿」，記錄家中位於揚州鄉下的田產。<sup>28</sup>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畢業，得獎助金，仍繼續滇緬泰邊區之語言調查研究工作，前後達八年之久。<sup>29</sup>

按：《詳析「匆匆」的語法與修辭·著者簡介》云：「畢業後，獲中英庚款補助，在滇、緬、泰、越山區，調查『擺夷』語言。」

### 民國三十三年(1944 年)，33 歲

10 月 10 日，夫人張敏言曾用毛筆小楷書寫「書畫碑帖目」二本，其一因長女方謙明頑皮，將此頁撕下自釘成小本學寫字，原頁已剪破不能復裝成幅，只好另書一頁以補之。<sup>30</sup>

---

<sup>28</sup>據方謙亮《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序》頁伍至陸。

<sup>29</sup>按，《臺灣話舊·滯留擺夷區》云「民國卅四年，日本宣佈投降的時候，我正在雲南西南部水擺夷區域，協助國軍從事後勤工作。我到雲南水擺夷區域去的主要目的，是要作擺夷語言的實地調查；可是當我到達擺夷區域以後，中南半島的局勢就開始改觀：日本軍隊向泰國、越南、緬甸侵入，中國政府也派遣遠征軍協防印度和緬甸。……雲南的水擺夷區域範圍很廣，我選擇了其中的一個最保守的地方，作為研究的對象：那地方就是屬於南嶠縣的『猛遮壩』。南嶠、佛海、車里是相連的三個大縣，也是水擺夷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但是車里是『車里宣慰使』的所在地，也可以說是擺夷區的政治中心，人來人往，比較熱鬧。佛海是繼思茅、普洱之後新興的茶業集中地，商業的氣息非常濃厚；只有南嶠還保持著較原始的風貌，人民與外界少有接觸，是調查土著語言最理想的地方。……最初我寄居在戛拱街旁邊的一所擺夷寺廟裡，以便早晚向老和尚討教；……不久我就搬到一個擺夷人家去借住。……就在他家旁邊租了一個穀倉，作為棲身之地。……主人家也經常到穀倉來教我說擺夷話、寫擺夷文。就這樣一住就住了一年多。我擺夷話的進步很快，可以一口氣說一兩分鐘的故事，……因此我的擺夷話自認為說得很好，只可惜擺夷文還是不認得，不會寫。……日本軍隊攻陷了泰國和緬甸，我國的遠征軍也從緬甸撤退到雲南，而車里、佛海、南嶠三縣，地處滇緬交界的邊區，更是首當其衝，成為撤退下來的遠征軍的第一處整編之所。……不知那位高人出了個餽主意，把我找了出來，叫我調集一千小和尚，作為軍民之間的連繫；我這個語言調查工作者，就搖身一變，變為臨時翻譯處的聯絡員了。」見頁 7。

<sup>30</sup>參見方謙亮〈揚州閒話序〉，收在《方師鐸先生四部曲之揚州閒話》。

##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34歲

2月，抗戰勝利的前半年，正在雲南的水擺夷區，從原本進行擺夷語言的調查，成為協助國軍從事後勤工作。<sup>31</sup>(8月20日)勝利後，從雲南的「思普邊區」折返昆明，路過普洱，在省立普洱中學教英文半年。

按：《臺灣話舊·滯留擺夷區》云：「民國卅四年，日本宣佈投降的時候，我正在雲南西南部水擺夷區域，協助國軍從事後勤工作。我到雲南水擺夷區域去的主要目的，是要作擺夷語言的實地調查。」<sup>32</sup>

《臺灣話舊·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云：「當我從雲南的「思普邊區」折返昆明的時候，中途路過普洱(即寧洱縣)。在一個『馬店』門口，碰到一位老朋友。堅決的留我在普洱城裡多住幾天。……我被當時省立普洱中學的校長硬拖到他們的學校裡，向數百名學生作了一次公開的演講。這一講不打緊，學生們卻向校長提出要求，要我到他們的學校裡去任教。老實說，當時我只是一心想回到昆明，對於在中學教書毫無興趣；可是那位校長一再挽留，只要我答應，教什麼課程都可以，……這樣可以多積蓄點錢，等到抗戰勝利的時候，好有盤纏回鄉。朋友的好意，和那位省立中學的校長一再情商，我終於答應了，在普洱中學擔任英文教員(為了怕改中文作文，所以改教英文)，作『誤人子弟』的工作。」

33



<sup>31</sup>按，方謙光〈三人行〉云：「因為父親所選的課題是雲南少數民族的語言調查。為了研究這個課程，隻身一人隨著馬幫深入到雲南西雙版納，到傣族(擺夷)集居地區做傣語的語言調查。此時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這些不同國家、不同種族，操著不同語言的人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完成這樣一項艱苦和鉅大的工程，非常需要互相協調和溝通，最缺少的就是翻譯人員，當時父親既精通英語和漢語，又精通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於是他就成了義務的連絡員和翻譯官。」見《風雨兼程--方謙光作品集》頁101。

<sup>32</sup>見頁7。

<sup>33</sup>見頁10~11。